

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现实向度的审视与反思

——“屏障与安全:云南生态文明区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高端学术论坛综述

聂选华

(云南大学 西南环境史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屏障与安全:云南生态文明区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高端学术论坛以知名专家、学者专题对话与讨论的方式,从人类学、生态学、民族史、环境史等不同学科领域视角出发,围绕“生态屏障建设与研究”“生态安全建设与研究”“云南生态屏障构建研究”等议题,对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的交互关系及现实诉求进行了深刻审视和反思。其成果既诠释了环境史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前沿和热点问题,也有益于促进学界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理路的探究。

关键词:云南;生态文明;生态屏障;生态安全;生态建设

中图分类号:X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4-0042-10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4.008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Real Dimension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 Summary of the High-level Academic Forum on Barrier and Safet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Yunnan Regional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NIE Xuanhua

(Institute of Southwest Environmental History,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091)

Abstract: With the forms of the thematic dialogues and discussion, the High-level Academic Forum on Barrier and Safet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Yunnan Regional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hows the thorough review and reflection to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real demands from the well-known experts and scholars with the topics of ecological barrier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ecological security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and ecological barrier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a variety of perspectives such as anthropology, ecology, national histor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etc. The results contain the frontier and hot issu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the research of the academic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barrier construction.

Key words: Yunnan provinc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barrier; ecological security;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2016年12月2日至6日,由云南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联合主办的“屏障与安全:云南生态文明区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高端学术论坛在云

南召开。本次论坛得到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 and 北京生态文明过程研究院的多方指导,以及云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和科学出版社给予的大力协助。

收稿日期:2017-03-14

基金项目:第二批“云岭学者”培养项目“中国西南边疆发展环境监测及综合治理研究”(201512018);云南大学服务云南行动计划项目“生态文明建设的云南模式研究”(KS161005)。

作者简介:聂选华(1987—),男,云南会泽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时期西南灾荒史、环境史及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论坛开幕式由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党组书记、博士生导师周杰研究员主持,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会长助理、副秘书长王春益研究员代为宣读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会长陈宗兴的书面致辞,云南大学党委书记杨林教授和云南省林业科学院院长王卫斌研究员发表开幕式致辞。来自中国台湾、北京、上海、南京、厦门、广州、四川、湖北、陕西、云南以及英国、德国等国内外30多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出版单位的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

生态环境与历史的发展关系是学界各研究领域深入探讨的一个重要论题,历来为社会公众所关注。生态环境的变迁以及人类文明的演进和发展所引发的环境恶化约束着人类生境和文明的延续形态,建立一种谋求人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生态经济模式,构建全新的生态文明型社会,促进并实现人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新常态下探究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及其模式形成的重大课题。探究环境史并将生态视野纳入其对生态文明阐述的方法论之中,描述人与生态环境间互动的历史,从时空维度上为我们分析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向度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在本次论坛上,各位专家学者通过主题报告和分论坛专题圆桌对话的形式,针对环境史研究和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就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在认知和实践层面的理路与方法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为云南建设多元一体的生态文明和生态安全屏障“把脉开方”。

当前,云南存在国土生态安全、水资源生态安全、林业资源安全、生物多样性安全等重大生态安全问题。与会专家学者对云南省情和地方社会现实给予高度关注,并结合自己研究专长,深入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多渠道对话和全方位合作,努力推进七彩云南自然生态系统、人工生态系统和自然——人工复合生态系统的生态安全屏障建设,齐心协力维护西南跨境生态安全和重要生物资源安全,共谋我国西南及周边国家的生态和谐发展和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现将本次论坛的主要学术观点简要综述如下:

一、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研究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相并列的一种新型社会文明形态。生态文

明建设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与建设生态屏障和维系生态安全一脉相承。在生态文明建设新常态下,对生态屏障和生态安全建设的目标、原则和内容框架进行分析,需要深化对环境史研究与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理论与方法的认识和思考,借此探寻已突显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破解路径。

(一)对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性反思

环境史作为新兴史学,其兴起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环境保护、生态修复、生态屏障和生态安全建设等领域的革新,尤其是学界对环境史理论与方法的探讨,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生态文明作为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与系统工程,其包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追溯,而后者就涉及环境史。厦门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钞晓鸿教授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环境史——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指出:历史不再只是人类与社会的历史,而是人与自然对话、相处和共存的历史;历史也不再只是人类的自我诉说,增加了自然的议题与内容,因而自然就进入历史。历史研究不仅只是文化创造,自然与文化之间存在互动关系。钞晓鸿教授认为,环境史加深了对人类利用、干预自然过程及其是非得失的认识,从而深化并拓展了对历史发展评价、历史发展前途的认识。历史的发展,不再单纯以社会经济作为尺度,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变化——特别是引发的环境问题,也需要考虑在内,其中环境状况是衡量整体发展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此外,他还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促进环境史研究,而对环境史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探讨,也将有力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地方性生态环境的认知进行交融与整合,建设生态共同体需要深化对人和生态环境交互关系的探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Andrea Janku 教授在《八景与生态文明建设》一文中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八景”不是一种现实,而是一种文学的形象表达,“八景”中的每个景都可能是一部纯粹的环境史。她认为,云南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强调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对环境的看法及其影响。德国海德堡大学 Nanny Kim 教授《生态文明与地方智慧:田野考察感想》一文试

图探讨地方性知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她主张,生态文明和生态发展都需要正确认知区域内人和生态环境的关系,开展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工作重要的是保留这些地方的传统生态文化,同时通过建立网络平台能够给教育者和决策者提供更为系统的生态环境资料。另外,她还指出,如果对生态文明多样性的理解是合理的,那么这对生态文明建设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对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基础理论的研究

文明存在的基础是持续性生态系统始终处于动态平衡的状态,文明得以持久延续和发展的关键是保持养育人类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存在。“人类文明演进历程与产业发展历程密切相关,每一次文明的进步和飞跃都是建立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等不断提高的前提下,而且必然伴随着生态安全的变化。”^[1]环境史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对生态环境及其相应的生态位进行分析,并正确认识生态环境的变迁对人类文明形态演变的影响。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常务理事、国家林业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黎祖交教授在《“生态环境”的意涵再探》一文中认为,“生态环境”的意涵是“生态和环境”或“生态系统和环境”,其核心要义是生态系统,且主要是自然生态系统。生态文明理念及实践道路应是多元的,生态文明的实践路径需要从其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中进行深入探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室周宏春研究员则通过其论文《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概述》对国家层面的生态文明建设过程进行了阐述。他指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值得深入探讨,可就公众所关注的生态文明及其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方面进行研究。他认为:人是生态文明的主体,如果人们都先尊重自然再开展工程建设,便可以创造出真正的文明;面对当前的环境问题,健全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理顺资源政策价格体系,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立法,发挥市场机制的效用,促进各部门集成协调,将生态文明纳入教育体系,可有效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安全是衡量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生物与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标尺标杆。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客观上为解决当前的环境问

题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导。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力度,尤其是注重人与自然关系的修复和秩序重建,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夏明方教授在《无为而治:当代中国的生态修复与社会发展》一文中指出,自然系统是人与自然的一个混合体,而不是一个相互隔离的状态,所谓生态修复,不完全是自然环境的修复,更重要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修复,借此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调整,最终寻求自然与自然的安排符合人类的利益。他强调,生态修复与社会发展需要给自然松绑,最终是给人类的自我松绑。另外,遏制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态恶化,构筑稳固的生态屏障,是边疆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当务之急。就此,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周琼教授在《自然与人为之间:生态安全与屏障的“建设”探讨》一文中提出,在国际化的冲击下,发展边疆地区的生态环境,要更加注重自然修复,减少人为因素的干预,最大程度助力自然生态屏障的建成,这是当代生态屏障及生态安全建设的根本原则;建立具有高度安全性的生态系统,需依靠自然力和遵循原有的自然基础,这可为维护边疆地区邻近区域及国家生态安全提供保障。

(三)对环境伦理与生态伦理的透视

人的自然生态活动反映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蕴藏着内涵丰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态伦理作为人处理自身与周围生态环境及其各要素等生境关系的道德规范,是人们在开展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活动中所形成的伦理关系及调节原则。环境伦理观和生态文明伦理观具有社会伦理关系结构的双重性、人类文化价值理念生态化与实践性的特征,坚持以生态伦理为指导,开展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伦理研究,可推动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逐渐转向生态文明。台湾东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王鸿禧教授从历史角度切入,在《生态文明伦理之比较观点》一文中解析人类在地球环境发展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并以20世纪主要环境伦理学派的观点解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研究的互动关系。王鸿禧教授归纳中西的伦理观,对整体环境伦理、自然本质价值的论述以及生态文明社会建立的必要性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人类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四个象限模式实

则涵盖了各种主义和主张的精髓。关于生态文明伦理的实践,王鸿潜教授认为,要确定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高度依存关系、考量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现代价值,并在相互依存和共同演化的关系下,思考建立新的环境伦理观。

生态文明以一种崭新的文明思想和社会形态推动着中华文明在人与自然关系的互动和交流过程中不断实现转化和升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蕴含丰富的生态文明理论。剖析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意义及思想渊源。自然资源应被社会运用而非被占有,尊重自然、构建生态道德价值观,可合理调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孟根龙教授在《社会主义生态基本三角思想简析》一文中,深入分析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福斯特的社会主义生态三角思想,明确指出了当前造成我国环境问题的原因。他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也应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既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又要遵循公平和各自能力原则,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四)对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考察

环境史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可在历史与现实间寻找链接口,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研究就是其重要的学术增长点。建立生态文明价值观,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仅可以明确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目标和路径,而且还有助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进程和维护区域生态安全。中央党校哲学部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赵建军教授在《绿色技术范式与生态制度》一文中指出:绿色技术范式的内在逻辑包括“绿色技术群是绿色技术范式的‘硬核’”和“社会对绿色技术的建构推动绿色技术范式逐渐成熟”两方面;绿色技术范式和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归根到底是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因此要打破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让绿色技术范式与生态文明制度形成良性互动,并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求,将绿色技术范式和生态文明制度统一落实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过程中。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林震教授在《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制度》一文中建议,由于云南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尤其突出,应从明确审计的对象、内容、方法和目的,加强部门合作和数据共享,强化队伍建设和公众参与及防止绿色造假和绿色腐败五个方面,推动云南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

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机制既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促进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关键保障。《昆明理工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徐绍华教授在《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动力机制研究》一文中认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性障碍阻碍了云南省的生态文明建设,但也凸显出建立生态文明动力机制对促进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需要通过建立“政企学民”四位一体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公司企业、学术机构和社会民众的主体驱动作用,整合各方力量,完善动力保障机制,促进云南省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发展。北京大学哲学系徐春教授的《生态文明建设新机制路径探索》论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出发提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史螺旋上升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生态文明建设要以“三生共赢”为根本目标和行为准则,以“三生共赢”准则创建生态文明建设新机制,其中社区介入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微观路径。云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于尧研究员在《浅谈构建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路和方法》中,论述了生态文明建设所涉及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当下与未来等不同主体在不同时空中的多重关系,认为可采用层次分析法,突出定量、现状、进度、功能和贡献等要素,根据整体性、定量化、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构建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评价指标体系,以此为全省生态安全屏障的构筑提供保障。

二、区域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个案研究

环境史研究可促进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和质疑。生态文明建设是对生态环境和社会历史未来持续发展的美好憧憬。随着人类对区域可持续发展越来越重视,区域生态环境问题及环境史研究也渐次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根据区域生态特征和环境问题,明确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环节所应采取的措施,能够有效保护生态环境,还可形成区域示范效应。

(一)对区域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的反思

生态环境保护是有序推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措施。环境史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根本目的是解决环境问题。生态环境保护取得的任何成效,都是对环境史和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突破,并直接影响生态安全屏障的建设进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荀丽丽研究员在《国家生态治理及其文化维度:基于西北经验的反思》一文中以西北地区的调查为分析对象,认为当生态危机进入国家视野后,其相对应的生态治理政策难以避免地是危机应对式的。她指出:危机应对式指的是难于以一种社会或文化等综合角度去看待生态治理,只能亟需依靠国家财力和人力的大量投入,当然这种投入也迫切想要看到积极性的成果,这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一个需求;文化的生命力与社区“共同体”的生命力相辅相成,探索能够为维护地方社区共同体及其自主性提供保障的制度体系,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

地方显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区域差异性、区域流动性和区域复杂性的特征。针对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问题实施差异性的举措,有利于促进区际之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合作机制的形成,并能有效推进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物安全和用水安全的保障相辅相成。秦岭是我国陕西省的主要水源涵养区,也是国家水安全的重点区域之一,承担着确保西安供水和“一江清水送北京”的重大历史使命。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党组书记周杰研究员在《秦岭地区生物多样性变化与水安全》一文中指出: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加强,秦岭山脉水源涵养地水环境质量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日益突出,且现有流域管理制度的缺陷严重影响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从秦岭地区自然环境变化、社会经济活动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辩证关系看,对以生态经济为核心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是在秦岭水源涵养区开展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手段,相应地可以为区域安全提供保障。

生态文明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支撑点,也是经济全球化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必

然要求。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提高全社会对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视及全人类共同保护和建设地球家园的认识。通过构建生态文化,可以把人重新归位到与自然和解的关系中。南京大学应用生态研究中心李建龙教授在其论文《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理论及应用——以苏州市吴中区实践为例》中认为,城市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需要考虑代表性原则、动态性原则、数据可得性原则和系统性原则,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需从城市生态系统构建的原理和特点出发,根据城市生态的结构和功能,从生态文化、生态经济、生态社会和生态保护多层次、多目标等方面加以综合考量,既要关注指标选择的全面性,也要考虑指标选择的可实施性和可考核性。

(二)云南地方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

生态文明理念与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政策性、耦合性、整体性、地域性和密集性等特征。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科学、全面、系统的战略任务,重在建设,成在持久,贵在创新。云南生态文明区域建设及实践,需要立足于云南地方社会实际,从区域生态空间、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以及生态制度多维度探讨生态屏障和生态安全建设的可操作性,以推进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总体目标的实现。云南大学原副校长林超民教授在《天蓝地绿山清水秀——腾冲生态立市的实践》一文中通过对云南腾冲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状况的分析,充分肯定了腾冲市近年来在生态和环保领域所做的工作和成绩。他认为,腾冲市的发展经验是责任、制度和理念,这是促进腾冲始终保持好、维护好绿色品牌优势的关键所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吴健教授撰写的《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基于一个案例的观察》论文,基于在滇西北长江中上游的考察,探讨了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生态是一个自然的界面,经济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另一个界面,生态文明实际上是关于两个系统之间的交互关系,二者可形成一种平衡持续的态势;生态保护能否支撑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生态保护政策与地方生计发展的目标能否充分融合,而在生态系统管理中保持充分的社区参与,有助于

生态保护政策与当地发展目标相融合。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生态破坏严重、生态灾害频繁、生态压力巨大等突出问题,遵守尊重生命原则、生态共同体原则和环境正义原则,积极开展生态灾害防治,实施灾害科学管理,提高生态环境效益,补齐云南的生态短板,是云南保护自然资源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稳定性的重要前提。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高建国研究员在《屏障与安全:云南碰不得——云南现今农房抗震能力状况》论文中,以云南地震灾区的考察为例,将云南历年地震统计数据与其他省区地震灾害进行对比,认为“选址不当、地基不牢、缺少构造柱和圈梁、房屋开间、跨度和前后门窗开洞过大以及墙体缺乏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等因素,导致云南地震灾害具有“小震大灾”的特点,并针对性地提出培训建筑工匠、提供农村抗震安居房屋设计方案、继续开展“禁实”工作和筑牢地基等具体解决措施。国家林业局昆明勘察设计院农业与生态环境工程设计所刘永杰研究员在《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怒江州森林防火体系构建》一文中,将怒江州分为“高山保护与监控区,中低山重点巡护区,河谷群众联防区”三个森林防火体系构建区,提出了在怒江全面建设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森林火警预警监测体系和数字化通讯指挥体系,构建立体、现代、高效的森林防火预警及扑救保障系统,以此推进怒江林业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建议。

滇池的生态发展要实现污染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双赢,应以恢复流域生态系统功能、改善湖泊水环境质量为工作重点,千方百计塑造湖泊的水文生态环境。云南大学生态学与环境学院段昌群教授在《滇池污染治理与昆明生态化发展》一文指出:“云南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重点区域,云南是排头兵,而昆明应该成为旗手”;滇池治理存在“容小”“少水”“割肾”“取肺”“败血”“绝后”六大先天问题,滇池的未来之路要依靠“昆明的生态化发展”,必须坚持和实现减压发展、清洁发展、优化发展和跨越发展。

喀斯特生态系统较为脆弱,承载能力低,对区域生态安全具有重大影响。喀斯特区域生态安全是否保持在稳定状态,在时空上与喀斯特生态环境具有耦合性。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王世杰研究员的《西南喀斯特地区石漠化治理与区域发展》一文,

从喀斯特地区石漠化治理的背景、成效、驱动力和综合整治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建议五个角度进行全面的探究,深入浅出地分析了石漠化治理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认为加快国家重要经济带的生态屏障建设,提升西南喀斯特地区的石漠化治理速度,需加快区域精准脱贫和生态扶贫的步伐,谋求构建区域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局面。

(三)经济发展方式生态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命题是经济发展方式的生态化。生态文明建设若要实现生态环境发展与生态经济化的统一,须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经济发展方式及其生态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息息相关。建设生态文明要高度重视生产效益型集约农业、资源节约型循环农业、环境友好型生态农业和产品安全型绿色农业的发展生态化,以尊重自然为原则,以当代生物科学技术成果的有效应用为支撑,充分利用生态系统的自然生产力,提升生态文明型农业产业和生态立体经济的发展水平。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于富强研究员在《一种混农林立体生态经济及其应用前景》文章中认为:腐生型食用菌的培植可成为云南混农林立体生态经济的典型示范,利用菌根型食用菌树木等共生者的生活特性,可建立一种植树造林与食用菌培育相结合的新型复合生态农业模式;利用腐生型食用菌纤维素等分解者的生活特性,以及农林牧业副产品和加工下脚料,发挥云南山地气候与植被资源优势,能在田间、林地发展食用菌“轮作”“套作”“间作”的生态培育模式。

云南西双版纳橡胶种植严重影响区域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能力和土壤质量的提高,恢复橡胶林区的生物多样性,正确处理橡胶种植的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当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抉择。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唐建维研究员在其论文《环境友好型橡胶园建设关键技术攻关与试验示范》中指出:西双版纳橡胶树大面积单一种植已导致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若增加橡胶林下植物的种类,则可以提高群落结构的复杂性,增强橡胶林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还能提高单位面积的橡胶产量、生物生产力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另外根据生态学和经济学原理,通过生物、生态及工

程技术与方法,建立多层次、多种类的胶园生态系统,其结构和功能可达到稳定和动态的平衡状态,也能够形成一种高效的人工生态系统。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原馆长、民族研究院生态人类学研究中心尹绍亭教授在《绿色发展——西双版纳橡胶种植的生态史》一文中强调,西双版纳橡胶种植涉及民族文化变迁、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西双版纳要实现绿色发展,就必须优化发展战略和调整产业结构,适度压缩橡胶种植面积,大力开展生态修复。

(四)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的突破——建设蓝色生态安全屏障

海洋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空间,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将更多地依赖于海洋资源。加强海洋环境保护,合理利用海洋资源,解决海洋建设遇到的生态环境问题,拓展海洋环境史研究,有助于推进海洋生态环境的协调有序发展和蓝色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是人的全面发展与海洋生态系统平衡之间的和谐统一,充分理解和认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对维系国家资源安全、经济安全乃至国防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国家海洋局生态环境保护司王孝强副司长在其《关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与实践》的论文中指出:我国海洋生态系统兼具多样性、脆弱性和封闭性,海洋生态文明的核心命题在于“形成并维护人与海洋的和谐关系”;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基础是尊重海洋、顺应海洋和保护海洋,基本方针是节约优先、保护优先和自然恢复为主,基本途径和根本目标是海洋开发活动向循环利用型转变。毫无疑问,海洋蓝色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对云南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经济发展、生态优化、环境保护以及绿色生态安全屏障的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的反思和超越

环境史不仅关注历史时期人类活动所处的生态环境,而且还高度重视当前人们所依赖的生存环境。环境史研究将自然演化与人类演进紧密结合起来,将重新认知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整合进历史话语中,并把生态环境视为阐释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因子,借此把握人与自然互动交融的历史脉动,并就生

态环境对人的可行性选择和回应的制约进行解释。环境史研究以历史的视角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心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联,环境史对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批判及对生态文明的反思,其根本目的是为人类摆脱生态困境、探寻生态文明的发展模式进行尝试和建构。“生态屏障是生态文明建设中构建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安全是生态屏障建设的目标,生态屏障则是生态安全的保障。”^[2]立足云南区域生态环境格局,从文明的角度正确认识生态系统,以发展的眼光保护生态环境,有助于进一步探讨生态文明建设及其主导模式的关系,从而推进生态安全屏障的建设。

(一)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的创新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通过“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统一来阐明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是对生态文明社会发展模式及其建立路径的系统诠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人居环境中心侯京林研究员在其论文《生态文明社会发展模式的建立》中阐述到,当工业文明以人类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对生物圈造成严重破坏后,人类被迫选择了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即生态文明的社会发展模式。她认为:建设“完善的智能圈”成为人类健康、可持续生存的必然抉择,农工商产业一体化作为生态文明社会发展模式的手段,在我国社会发展模式转型中将扮演重要角色;此外通过PPP集体经济组织财富的积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福利共享机制,这是生态文明发展模式创新,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生态文明作为国家治理的内在维度,其文化内涵对生态治理的阶段性和层次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内在系统层次对生态环境治理过程进行评价,具有一定程度的系统性、综合性和科学性。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副院长贾卫列研究员在《绿色发展引领发展新模式》一文中指出,绿色发展是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在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同时又重视自然保护,既满足当代所有人的物质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生存和发展环境,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模式和合理路径。

生态安全是人类在生产、生活和健康等方面不

受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影响,包括饮用水与食品安全、空气质量与绿色环境等基本要素。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博士后黄承梁在《建设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论文中讨论了可持续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即简朴生活、低碳生活和公正生活,认为这是更高级的生活结构。他指出,在生态文明价值观的指导下,人类的可持续生活需要社会的支持,需要确立公正平等的社会关系,不断发明创造绿色的高新技术和生产工艺,壮大绿色企业,推进绿色制造和绿色生产,积极开发绿色市场,倡导绿色消费。

(二)以生态文明理念推进生态共同体建设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不仅明确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开辟出我国经济建设新的增长点,而且有利于增进我国与沿路国家的经济繁荣和地缘政治稳定,有助于“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生态经济》杂志冯胜军主任在《“一带一路”中的生态经济和生态安全问题》一文中分析了生态安全问题,他认为:生态安全问题包括环境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生物安全等诸多方面,这不仅是国家和区域发展的问题,而且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难题;应当在“人类安全”观和“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思考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多层次的合作与交流,使国际社会能看到中国人民在向着人类安全的目标努力,中国的生态文明经验也会成为人类安全理念实践的最好例证,在验证并完善人类安全理念的同时,将会为其他国家所接受和借鉴。

屏障是一种厚重化的阻隔,也是一种纵伸式的保护。加强生态建设,实施生态安全战略,构筑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生态共同体,是新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主题,也是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国文教授在《生态屏障、生态城乡与生态安全》一文中指出:生态屏障是地球生境的独特呈现,它是自然界留给人类生存与宜居的地理遗产;生态屏障与生态安全既关切生态屏障自身的安全问题,也关注生态屏障影响其他区域的安全问题;生态安全作为人类活动触及自然界的达成,坚守它的基本价值,应是生态城乡建设必须尊重的根本底线;生态屏障在不同主体功能区位中的作用各异,并在稳定和缓冲环境变化、

生态产品的提供、生物物质良性循环、生命能量有效流动等方面构成了生态屏障系统整体的基本功能;生态安全的最重要标准是生态平衡,在呼唤城市生态乡村式回归的基础上,让生态乡村的理念凭借生态屏障的绿色动能反哺生态城市的低碳结构,能促使在城乡内部及城乡之间形塑与人类友好、结构优化的思维群落。

四、环境史研究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再认识

环境史研究与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核心命题是如何理解和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深化认识的基础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研究,有助于因地制宜建设生态屏障和构筑生态安全体系。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正确的文明历史观的有效引导,“建设生态文明,既非全盘否定工业文明,更非回归农业文明‘天人和谐’的历史幻想,而是文明体系的全面创新、变革和重构”^[3]。推进云南生态文明和生态安全屏障建设,需要从学理上辩证地认识和理解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之间直接同一的肯定关系、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之间相对独立的否定关系、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之间辩证统一的否定之否定关系。探讨三种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历史演变,归根结底就是要辩证地检视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环境的历史脉络和已凸显的环境问题之间的深层关系。

(一)少数民族传统生态认知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云南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因适应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自然环境,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化模式,对各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发展,对于推进云南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云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崔明昆教授《传统生态知识在区域生态系统安全中的作用——以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知识为例》一文在讨论传统生态知识及特点的基础上,对民族传统生态知识在区域生态安全中的价值进行探究,并以云南傣族农林一体的实践及苗族、布依族的传统生态知识为例,阐述少数民族传统生态知识在维护生态安全中的价值,认为应当在给予传统文化充分肯定和尊重的同时,将传统生态文化纳

入到当地政府的保护体系中,加强对它们的科学引导,使其在区域生态安全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李全敏副教授以云南山水文化为分析对象,以中缅跨境民族为研究基础,在《从山水文化看滇西南民族走廊的生态文明》一文中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分析了“滇西南民族走廊”所蕴含的生态性、地方性和民族性,借此探索滇西南民族走廊的内涵及其对生态文明研究的价值。其文指出,滇西南民族走廊的生态文明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基础,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引,崇尚自然,维系生态平衡,维护着民族团结进步和边疆繁荣稳定,透视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实践和行为规范。

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张修玉研究员则在《云南少数民族生态文明建设路径》一文中提出,云南各少数民族在与自然相依相存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傣族的“山林崇拜”、纳西族的“人与自然是兄弟”观念、藏族的“圣境信仰”以及哈尼族梯田文化,各民族以“善待自然、和谐共生”为基本理念的朴素生态观,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的伦理观、价值观与发展观的朴素思想,对此要加强对民族生态伦理道德观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并使其与现代生态意识相结合。关于云南少数民族生态文明建设路径,张修玉研究员认为,云南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实践,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和稳定,构建“生态空间科学优化合理的生态屏障区、生态经济绿色低碳循环的边疆开放区、生态环境清洁优美安全的舒适宜居区、生态文化人文多样繁荣的幸福和谐区与生态制度高效民主进步的团结稳定区”,为全面建成人与自然和谐的美丽云南提供理论参考与技术指导。

(二)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与实践

环境史研究强调问题意识,并要求在生态文明建设新常态下,对工业文明产生以来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进行质疑,对当前因掠夺式开发和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环境保护所引发的诸多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历史反思和检视。这种批判性的研究,引导学界深入探究人类生境中人与生态环境交互关系的整体性历史。探讨环境史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与方法的实践应用,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考察人类对环境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再认识,可在观念和行为上

促进人们对生产、生活方式的逐渐改变,对全社会形成文明的生态观和实现生态现代化具有重要导向作用。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既需要协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又需统筹推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以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永续发展。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郇庆治教授在《生态文明视野下的小康社会建设:2020及其以后》一文中指出:我们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来观察和评估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做出的努力时,更应该为我们在2020年之后新时期的发展寻找更为明晰的着力点和方向;以环保部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和以发改委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创建,明确要坚持“五位一体”或“五要素统合”的总体思路,其中政治维度已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及示范区创建中的严重“短板”;就云南的发展路径来看,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生态屏障和巩固生态安全,生态经济和生态旅游是更为适宜的选择。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戴星翼教授在其《追求七彩的生态文明》文章中认为,云南具有地理、气候、物产和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云南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和成果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要坚持尊重和延续各地区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尊重民众的首创精神,从政府、专家和民众三个维度有序推进七彩云南的生态文明建设。

(三)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现实借鉴

在本次高端学术论坛闭幕式上,各主题报告和分组报告主持人对小组发言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评价,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周琼教授代表主办方发表闭幕致辞。周琼教授认为,与会专家学者深入的探讨和交流,使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强化云南高原生态屏障建设、维护云南整体生态安全大局的观念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认同。除此之外,与会各位领导及专家学者集思广益、精诚合作、协同创新,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加强云南生态屏障和安全保障的十大建议》(简称《腾冲建议》)。《腾冲建议》是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的智慧结晶,是与会学者对长期以来云南生态文明建

设实践经验和发展目标的高度总结。它对建立健全和完善七彩云南生态屏障和生态安全保护体系具有积极的效用,对建设云南生态安全应急系统和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大现实价值和长远的战略意义。目前,《腾冲建议》已由云南大学以咨询报告的形式呈报给云南省委和省政府,以期形成云南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安全屏障构筑的指导性和保障性文件,借此为全省营造崇尚生态文明、推进自然保护、强化生态安全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力争为区域生态安全 and 国家生态安全做出新的贡献。

本次论坛涉及议题广泛,既有国家层面的宏观规划研究,也有学术层面的理论探讨,还有诸多涉及从不同学科之间对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方法的探讨,个案研究亦具有典型性。本论坛的研究成果,充分展现了宏观与微观结合、理论与方法共存、历史与现实对照,呈现了学界对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对推进云南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安全屏障的构筑具有理论指导和现实资鉴之功用。

五、结 语

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思想的提出,是党和政府在统筹当前和长远发展的需要、协调当前与长远发展的目标的综合考虑下,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重大问题的全面系统的回答,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前进方向中的重要

实践。在云南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对历史时期以来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历史性考察和具体研究,不仅有助于科学解读和分析环境问题的根源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而且还能够拓展历史研究领域和革新历史认知,并进一步推动环境史研究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有效结合。在生态文明建设新常态下,加快推进云南生态屏障保护与建设,维系西南生态安全,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底线和生命线,是云南生态文明区域建设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路径,是环境史对认识 and 解决云南现实环境问题的重新审视。对云南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和当前环境问题的溯源探究,厘清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特点、关键内容和模式选择,进一步深化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思考和生态哲学诠释,准确把握云南生态文明建设内在发展性与和谐性的基本特征,既是环境史对阐释生态世界观、生态价值观和生态发展观的再认识 and 再实践,也是环境史研究对生态安全屏障构建 and 生态文明建设现实诉求的多维度反思。

〔参考文献〕

- [1] 张智光. 人类文明与生态安全: 共生空间的演化理论[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23(7): 1-8.
- [2] 王晓峰, 尹礼唱, 张园等. 关于生态屏障若干问题的探讨[J]. 生态环境学报, 2016, 25(12): 2035-2040.
- [3] 王利华. 历史坐标上的生态文明[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5): 53-57.

